

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

——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

戴建兵

著



中国货币经济史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货币经济史丛书

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
——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

戴建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 / 戴建兵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 - 7 - 5203 - 0989 - 9

I. ①中… II. ①戴… III. ①白银—货币流通—货币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82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474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25

插 页 2

字 数 484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感谢中国钱币学会资助

目 录

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	(3)
全球视角下嘉道银贵钱贱问题研究	(23)
传统币制的缓慢演变	
——中国仿铸银元的历程	(43)
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	(51)
隐性中央银行	
——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	(60)
晚清民初货币制度中的国家制度与民间惯例	(77)
浅议清末和民国时期钱庄、银号和银行的票据	(89)
中国近代货币改革思想评论	(103)
李大钊货币思想刍议	(113)
张謇的货币金融思想与实践	(118)
传教士与中国货币	(129)
中国近代币制的转折点	
——机制制钱研究	(146)
清和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的纸币	(155)
中国近代几种商业银行纸币的券别	(170)
清代东钱研究	(175)
清代私铸小议	(196)
乾隆朝铸币与 GDP 的估算	
——清代 GDP 研究的一种路径探索	(203)

上海钱庄庄票略说 (220)

—

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研究(1921—1935) (22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政策研究 (236)

论中外合办银行的纸币发行 (245)

美丰银行及其纸币发行 (264)

关于民国年间的一些花店票 (272)

试论近代西北货币的发展

——以甘青宁为中心 (278)

石家庄近代金融研究 (293)

近代中国和意大利合办银行略论 (308)

浅析冀察市政特殊化及冀察自铸辅币 (326)

日本对华经济战中被忽视的一面

——日本在华公债政策研究(1931—1945) (336)

一笔尚未清算的战债

——抗战时期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中国发行公债之残留 (35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货币战时策略初探 (361)

抗战期间港、澳有关货币三题 (372)

浅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战时货币的整理 (375)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 (385)

浅论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货币斗争 (389)

—

金融史资料的散失与收集 (399)

第一届中国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406)

第二届中国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416)

第三届中国金融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424)

一代大师百草成集 (431)

目 录 ◈

智者之泉 泉家之智	(433)
关于大中银行辅币券发行疑点的说明	(436)
关于抗战时期“伪银行”的通信	
——答加藤正宏先生	(441)
读李铁生先生《古罗马币》有感	(445)
读《日伪政权的金融与货币图说·伪满洲国卷》有感	(448)
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成果百年回顾	(453)
一部独具特色的外债史研究成果	
——评马陵合的《晚清外债史研究》	(461)
读刘志英著《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	(466)
中日货币对谈录	(470)
后记	(480)



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

1890—1935年，国际货币经历了金本位制由稳定到崩溃及信用货币应运而生的时期。中国则走过了货币发展的异常复杂时期，从清中后期主要流通银两、铜钱和纸币（含私票），到晚清民初流通银两、银元、铜钱、铜元、纸币（含私票）等货币，以及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再到发行金汇兑本位下的信用货币（管理通货）——法币。^① 在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以及相关的货币史和金融史的著作已经很多。^② 但依据金融学学理，仍有深化的必要。本文研究的近代货币特指自1890年中国机制银元产生至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的中国货币，力图将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钱币学三者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进行分析，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些规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① 本文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视域下的中国近代货币研究”（课题号10GJ015）的成果之一。洪葭管亦认为法币为金汇兑本位。参见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相关研究论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映岚《中国货币沿革史》，东京砥斋1911年版；章宗元《中国货币沿革》，经济学会1915年版；张家骥《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世界书局1929年版；耿爱德（E. Kann）《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戴铭礼《中国货币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史纲》，周伯棣编译，中华书局（上海）1934年版；朱偰《中国信用货币发展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千家驹等《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一 白银核心型的中国近代货币体系

货币本位（standard）是一国货币制度所规定的货币的基本单位与价值标准。金本位是以一定量的黄金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银本位是以一定量的白银来表示和计算货币单位价值的货币制度。此外，还有因经济发展状况及金银供给等问题引发的两本位制，即金银平行本位制和金银复本位制。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平行本位制下的金币和银币可以自由铸造，而复本位制下的金币与银币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的。^①

“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②“任何时代金融交易都是贸易交易的自然延伸”。^③金融的发展加速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崩溃、金本位制衍生的如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流行及向管理通货（纸币）发展几个较大的变动阶段。^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各参战国禁运黄金、纸币停兑黄金，导致国际金本位制实质上被废止。战后，随着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⑤各国也相继恢复金本位，但实际上黄金的地位被大大削弱。除美国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和英国推行金块本位制外，其他国家则大多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即使实行金本位制，为了减轻压力，也极力主张以国际金银复本位制来替代金本位制。^⑥金汇兑本位制经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岌岌可危。1931年9月，英国第二次放弃金本位。^⑦为维持国际贸易，英、美、法均组织各自的货币集团，同时，世界币制也发生变化。随

① 参见武康平编著《货币银行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2页。

② 洪葭管：《中国金融史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 [英]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7页。

④ 参见李世安《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

⑤ 参见[美] 约翰·H. 伍德《英美中央银行史》，陈晓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⑥ 参见马寅初《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47页。

⑦ Gary Richardson and Patrick Van Horn, “Fetters of Debt, Deposit, or Gol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International Propag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1,” *Economic History Yearbook*, Vol. 52, No. 2, pp. 29—54, 2011.

着中央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信用货币（管理纸币本位、管理通货）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①

1840 年后，中国被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货币本位并没有与国际接轨。

近代中国的货币，种类极为复杂，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有：银两、银元（自铸和外国银元两大种类）、制钱、铜元、银行券、私票等。^② 时人多认为近代中国货币“芜杂紊乱”^③，是“最复杂的一种”，外国学者认为近代中国货币“缺乏体系”^④，甚至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⑤。

具体到光绪朝中期以前的货币本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有两种：银钱平行本位^⑥、银铜复本位，^⑦ 其学理来源均为上述西方金银平行或复本位制，实际均不确切。因为清代流通的银铤和铜钱都近似本位货币。但是银两是可以自由铸造的，^⑧ 而制钱却被清政府严格控制和管理，严禁民间私铸，私铸首犯及匠人均治以处斩等重罪。这与金银平行本位制中金银均可

^① 参见李成主编《货币金融学》，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25、30 页。

^② 详见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中国钱票》，中华书局 2001 年版；《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货币金融史》（与陈晓荣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这是日本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评价。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说：“一等国用（支票）转账，二等国用钞票，三等国用硬币，若四等国，并币而无之，则用生金银。”（《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编：《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8 页）而英国人毛里斯·柯里斯则称：“中国人是没有铸币通货的。其交换媒介就是作为金属的白银。”（[英] 毛里斯·柯里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1 页）

^④ Frederic E.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2, p. 8. 清末度支部币制顾问、北洋政府财政部顾问、荷兰银行总裁卫斯林认为中国没有实质的本位制度，“Thus far China has had no real standard”，(Dr. G. Vissering, *On Chinese Currency, Preliminary Remarks about the Monetary Reform in China*, Amsterdam: J. H. De Bussy, 1912, p. 5)。

^⑤ 赵兰坪编著：《货币学》，正中书局 1936 年版，第 500 页。

^⑥ 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册，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85 页。1962 年杨端六先生就明确认为这是不完整的平行本位制（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 页）。

^⑦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 年）》，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 1981 年版，第 5 页。

^⑧ 乾隆时期，江浙大县银匠多的有数百名，小县有十余名。参见浙江布政使潘思榘《奏陈整顿钱法之末议事》，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 03-0770-047，缩微号 052-06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自由铸造为币的原则大相径庭。此外，制钱是由贱金属——铜及铅、锌铸造而成，这与西方货币本位制度中两种货币金属均由贵金属构成，有着明显区别。无论是对货币单位，还是主辅币制度，货币本位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中国的称量货币——银两的基本单位“两”及成色在国内却千差万别。^① 此外，尽管清政府在清初就规定了银一两等于制钱一千文的比价，政府也极力维持，但实际上银钱比价随行就市、时有变化，银两与制钱并非主辅币关系，这与复本位制中两种货币金属的法定比价是不一致的。因而此时的货币与严格意义上的任何本位制度均有较大距离。

那么，自光绪朝机制银元出现后，中国是否开始进入银本位时代呢？

光绪十六年（1890），广东钱局银厂开始铸造银元，随后各省纷纷仿效，使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出现新的等价物——银元，掀开中国近代货币史新的一页。1905年10月，清政府财政处拟定《铸造银币分两成色章程》十条，^② 确定了本位货币为库平一两；1910年又订立《厘定国币条例》，^③ 规定了银币的重量及其辅币；1914年2月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5条，^④ 对银币的面额、重量、成色、辅币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有学者由此认为此时中国已为银本位。不过，这些条例仅是具文，当时流通领域中的银质货币——无论银两、银元还是银角，均按重量、成色天天有行市，彼此之间并非主辅币关系，^⑤ 从而谈不上银本位。对于晚清民初的货币制度，学者多因纷乱的货币现实而将之归为多元本位。^⑥

① “清代时中国各地行用的平，总计起来，当不下一千种。”（张惠信：《中国银锭》，台北齐格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在清朝，中国全国所用的‘平’无虑几百几千种。”（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78页）“据民国初年中国银行调查，各地通用的平砝，即有一百七十余种。”（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30页）

② 参见奎濂等校勘《度支部通阜司奏案辑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80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1840—1911》第2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83—789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12—1927）》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⑤ 参见金伯琴《银辅币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5号，1927年3月10日；沧水《论推行新银辅币之必要》，《银行周报》第4卷第3号，1920年1月。

⑥ 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博士（Edwin W. Kemmerer）受聘为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顾问，提出《中国逐渐采用金本位实施草案及其理由书》，认为中国当时为多元本位（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64—1937年）》，第5页）。

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发达国家均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国际环境之中，那么，中国近代究竟具有一种怎样的货币体系呢？

实际上，中国近代币制是十分独特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银行学上本位含义可以对应，其构成实质是十分独特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铜钱为币的传统改变，铜钱和白银（银锭和银元）均开始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①清初沿袭明制，钱粮收银。顺治十四年（1657），“直省征纳钱粮多系收银，见今钱多壅滞，应上下流通，请令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银则尽数起解，其钱充存留之用，永为定例”^②，从而强化了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而在市场流通中，早在乾隆年间，市场用银已占据相当主导地位。当时朝廷下令“各督抚转饬地方官出示剀切晓谕，使商民皆知以银为重，不得专使钱文”^③，商民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即使边远的西北地区也是如此。^④

之所以宜称之为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是因为近代市场上各自流通复杂多样的货币（纸币是硬币的货币符号）均以白银为核心兑换，并在市场上与之发生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货币市场，在1915年8月前为龙洋（龙洋折合银两数）行市，此后改为鹰洋行市。^⑤自1919年6月废两改元前，上海货币市场每天挂出各种货币行市以及相应银两借贷利率，分别为：每日银元一元合规元的“洋厘”约期买卖的银元市价即“期洋”；银辅币十角合规元的“小洋”；规元一百两合铜元的“铜元”；银元一元合铜元的“兑换”；小洋一角合铜元的“角子”；小洋一角需贴水合大洋一角的“贴水”，这些每日公布的货币行市均是以银两、银元、银角标价的。此外，相当于当时借贷市场基准利率的“银拆”

^① 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3《钱币一》，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④ 参见甘肃巡抚鄂乐舜《奏复查办通省钱价大势平减事折》，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号03-0771-059，缩微号052-09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参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即规元一千两之日利)也是以白银标价的。^① 其他各地亦有相应的类似组织以银两和银元为标准, 每日公布当地的货币行市。^② 可见, 白银居于货币市场的核心地位。

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与银本位的最大不同在于: 银本位制要求的是单一银本位币及相应的辅币制度, 而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没有单一的本位币, 银元和银两均发挥着类似本位币的作用。同时没有辅币制度, 银角、制钱、铜元实质上都不是银元或银两的辅币, 均可独立在市场流通。

整体来看, 法币改革前, 近代中国的各种货币都与白银关系密切, 均可通过比价折合为银元、银两, 但折合比价是动态的, 这与西方国家货币本位中非常重要的比价严格固定的主辅币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是中国货币向银本位发展的阶段, 发展过程是日益向银收缩。最初表现就是晚清民国后造币厂大量铸造的银元, 一方面取代铜钱等传统货币, 另一方面侵消市场上的银两地位, 并导致虚银两制度形成。虚银两制度以一些区域性的大中城市为核心, 并影响广大区域, 如上海九八规元、天津行化、武汉洋例、绥远拨谱、营口炉银、安东镇平银、汕头七兑等。铜元随着银元流通及自身的滥铸, 价值日低, 使用范围缩小, 实质是向辅币地位转化。1933年, 中国政府废两改元, 标志着中国进入银本位时代。^③

二 外国势力对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 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

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白银, 其货币表现形式是银锭或银元。1943年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 世界产银量最多的地区为北美中部、南部。

^① 参见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 华通书局1931年版, 第97—98页。

^② 20世纪30年代江西南昌汇划公所附设于钱业公会组织之下, “规元、洋例、银元、口拆、铜元、盐封、申钞、杂钞等行市, 皆由公所挂牌, 以为全市交易之标准”(参见杨祖恒《南昌之金融》, 《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2—3号合刊, 1933年1—2月)。

^③ 因银本位刚一确立就发生白银风潮而导致法币改革, 故本文所探讨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截至1935年的法币改革, 即与白银基本脱离关系为止。

17世纪秘鲁、巴西发现新银矿，18世纪墨西哥几占该世纪银产量之半。但是，以白银为币的中国银产量“殊无几也”^①。明代以来，由于对外贸易发展，国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②至近代，中国产银量仍非常有限，^③北洋政府时期最高年产量不足5万两。^④1925年调查发现中国的产银地仅有五省，总额为35569两，其地域分布如表1。

表1

中国各省的银产量

省别	产量（两）	值银元数（块）
湖南	20000	26000
四川	1569	2040
广西	10000	13000
云南	3000	3900
热河	1000	1300
总计	35569	46240

资料来源：企云《远东之银》，《钱业月报》第9卷第6—7期，1929年。

因中国产银量有限，白银的输入自然十分重要。据杨格统计，1888—1931年中国共输入白银达103700万盎司。^⑤白银由外部供给这一特点对近代中国经济影响巨大。晚清的白银外流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白银风潮均可

① Tomoko Shiroyama,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International Order of Asia in the 1930s and 1950s*, Toky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08, p. 4. 亦可参见邵金铎《银价之研究》，上海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8年版，第1页。

② 傅镜冰是较早涉足此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1933年发表《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行月刊》1933年第6期），考证了明清两代外国白银输入中国的不同时期和途径，并推算明末至清朝中叶外国白银输入的数量总计3.5亿元左右。另可参见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③ 洋务运动中，银矿仅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广西贵县天平寨银矿等开采，但成绩不大（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271页）。

④ 参见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页。

⑤ 参见〔美〕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归结于此。由于白银的外部供给，中国货币市场上极易创造出新的货币（如私票），日益激化复杂货币体系内的竞争，还导致中国很长时期内都是商品和白银双人超的国家。^①

晚清中国国门被打开后，逐渐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白银的需求日增。1890—1928 年中国净入超白银 627177427 关两。^② 1918 年中国成为白银纯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白银达 2350 万关两。1925—1927 年的白银进口分别为 6300 万关两、5300 万关两、6500 万关两。^③ 1928 年、1929 年两年更为突出，分别净进口白银 10640 万关两、10580 万关两。与此同时，黄金净出口近 200 万关两。^④

货币量的多寡对经济是否发展影响十分巨大。因中国经济体内的货币量决定于白银的进出口，而白银的流动掌握在外人之手，导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强力控制。

（二）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

白银的输出入与近代中国的货币数量、价值、汇率及内外贸易均有着直接关系。中国大条银市场被国外白银市场控制的最显著标志就是上海的对外汇价以伦敦大条银价格为标准。^⑤

^① 早在 19 世纪晚期，与英国皇家金银委员会有关的学者就对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每年要用 100 万至 200 万磅黄金平衡贸易，但是在 1864—1886 年，中国每年平均出口了 10 万多磅的黄金。而在出口黄金的同时中国的白银进口超过了白银出口，1877 年，差额达 530 磅”（*Royal Commission on Gold and Silver, Minutes of Evidence*, p. 21, 转引自 Wen Pin Wei, *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 New York: Th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Colombia University, 1914, p. 35）。杨端六、侯厚培等通过对 1858—1885 年的研究，亦认为中国是金出口而银进口的国家，1889—1928 年中国净出超黄金 96760217 两（参见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 年第 4 号，第 159 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064—1065 页）。

^② 参见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1931 年第 4 号，第 159 页。

^③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3 页。

^④ 参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编《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812—1930》，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 1931 年版，第 70 页。

^⑤ 参见潘世杰《白银市场》，杨荫溥主编《经济常识》第 2 集，经济书局 1935 年版，第 90 页。